

文史知识

我与中国古典文学——答编辑部问

什么是宫体诗

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水经注》与游记文学

中国的罗汉

从丞相到三公——西汉职官之一

冯至

周振甫

杨德炳

任访秋

白化文

孙 钺

7

1984

WENSHI ZHISHI





医药学院610 2 01465719

文史知识

1984年第7期

(总第37期)

• 治学之道 • 我与中国古典文学——答编辑部问 冯 至 3

• 文学史百题 • 什么是“宫体诗” 周振甫 10

• 历史百题 • 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杨德炳 15

• 怎样读 • 《水经注》与游记文学 任访秋 20

诗 文 欣 赏	谈谈“情景交融”(怎样欣赏古典诗词之十一)	任中杰	26
------------------	-----------------------	-----	----

	说杜甫《饮中八仙歌》	孙艺秋	30
--	------------	-----	----

	富有美学情趣的名篇		
--	-----------	--	--

	——说张先的《天仙子》	陶尔夫	33
--	-------------	-----	----

	贬损当道 为民请命		
--	-----------	--	--

	——读郑板桥《潍县竹枝词》	喻 蘅	37
--	---------------	-----	----

• 文史书目答问 • 杜诗注本述评 廖仲安 王学泰 42

• 文史工具书介绍 • 漫谈汉字历史读音的检索 李思敬 49

• 词学名词解释(3) •

近体乐府 寓声乐府	施蛰存	54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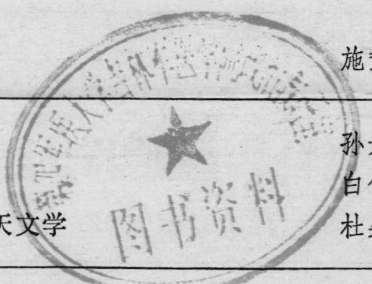
{文化 史 知识}	女乐倡优	孙景琛	58
-----------------	------	-----	----

	中国的罗汉	白化文	62
--	-------	-----	----

	诗歌、神话传说和天文学	杜昇云	68
--	-------------	-----	----

•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连载8) •

从丞相到三公——西汉职官之一	孙 铨	74
----------------	-----	----



人 物 春 秋	“一代辞宗”——沈约	张宝坤	78
	李晟与神策军	齐勇锋	83
	辛派词人刘克庄	李国庭	88
	反帝爱国将领刘步蟾	何双生	93

• 科举史话(连载十二) •

清代的武科

王道成 93

成 语	孺子牛	沈 含	104
	典故	一诺千金	李 夏 105

• 读书札记 • 偏催万树暮蝉鸣

(马来西亚)彼岸 103

语 言	我国古代的三族和九族	钱剑夫	106
	知识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原意索解	汤起康 109

• 青年园地 • 《哀郢》的一个动人情节

北京大学中文系 81 级研究生 章必功 112

• 文史古迹 • 秦始皇的铜车马

郭伯南 114

• 书画欣赏 • 梁楷笔下的李白形象

陈振濂 120

• 文史研究动态 •

《三国演义》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综述

沈伯俊 胡邦炜 123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1984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128

(一) 中国古代史试题

(二) 中国近现代史试题

• 补白 • 王戎俭吝(9)

豪门士族生活图 · 二幅(封二) 秦始皇的铜车马(封三)

· 治学之道 ·



我与中国古典文学

——答编辑部问

冯 至

冯至，1905年生，河北省涿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又赴德国留学。曾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主要著作有诗集、散文集数种，以及《歌德论述》、《杜甫传》、《杜甫诗选》等。

问：冯至同志，您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而在文学研究方面，又学贯中西，功力甚深。我代表《文史知识》编辑部向您致意，并请您就学习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有关问题，谈谈体会和意见。

答：我搞过一些创作，也做过一些研究，但无论创作和研究，都谈不上有何成就。在研究方面“学贯中西”，更不敢当，我只是对古今中外文学摸过一点，略知一、二，如是而已。至于我所积累的知识、我写作的量和质，就我现在的年龄说，都不相称，思之汗颜。

问：请谈谈您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从萌发兴趣到奠定根基的过程。

答：严格地说，我没有受过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系统训练。当然，我接触古典文学还是比较早的，入中学之前，我就读过《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唐诗三百首》等书。记得那时象《桃花源记》、《阿

房宫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作品和《左传》的一些精彩段落，念得很熟。1916年我十二岁，入北京市第四中学（即今北京四中），在那里读了四年（当时中学学制四年，不分初高中），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进一步浓厚起来，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的思想观点。我从中学的两位语文（那时称“国文”）老师那里受到不少教益，一位是潘云超，一位是施天侔。记得潘先生给学生讲解《汉书·艺文志》，拓展了我的眼界，又讲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使我懂得了一些文字源流，作品方面讲了不少汉魏六朝的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鲍照《芜城赋》等，那时我能把庾信《哀江南赋序》等背诵下来。给我印象尤深的是，他给我们讲了古来的一些愤世疾俗、寓有反抗性的文章，如《史记》里的《伯夷列传》、《游侠列传》等，记得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讲到《韩非子》的《说难》，共四部，每部先列出若干条事例，然后根据每条事例判断是非，韩非就以这种方式宣传法家思想，批评儒家和一般因袭观点，我读了后，思想上得到不少启发。那时在“五·四”之前，社会上尊孔风气还很浓厚，我们在课堂上听先生讲到韩非的“仲尼不知善赏也”等批评孔子的言论，很有些振聋发聩的感受。“五·四”运动前后，潘先生在一个报馆里兼任编辑，写署名社论，支持学生运动，抨击北洋军阀政府，被反动当局逮捕关了一年。潘举荐施天侔代替他。施先生来后就教我们读《庄子》，《庄子》散文那种汪洋恣肆的气势，读来非常痛快。他又给我们讲外国文学流派，讲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等，我对外国文学的粗浅了解，是从这时开始的。总之，潘、施二位老师给我打下了初步的文学基础，当时中学里也设数、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课程，而我终于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不能不说是受了两位老师的影响。

1920年暑假，我中学毕业，在家自学了一年，读了不少文学书籍，既有郭沫若、俞平伯、康白情等人的新诗，也有唐诗、宋词。1921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分系，只分文、理两科），两年后又入本科德文系。那时我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觉得中国的东西可以通过自学掌握，而外国的东西同我们距离太大，不专门去学就难以掌握。尽管如此，我在学德文的同时，也并未稍微

减弱对中国文学的兴趣。那时北大很自由，我只要有时间，就去听国文系的课。鲁迅的中国小说史、黄节的汉魏乐府、南北朝诗，沈尹默的唐诗等课，我都听了。我觉得这样中西文学兼着学，确有不少好处，主要是能够开拓眼界，打开思路，不为一隅所囿，可以彼此启发，加深理解。“五·四”时期，国内对某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作家作出了一些新的评价，如提高古典小说《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还记得胡适给《儒林外史》作序，一开始就说安徽的最大文学家不是方苞、姚鼐，而是吴敬梓，也是这种重新评价的表现。我认为，出现上述情况，也跟外国文学的影响有关。不过我那种中西文学兼着学的办法未能坚持，因为中西两头难以兼顾周到。于是我在北大学习的重头还是在德国文学方面，正因此，我的古典文学基本功是不扎实的，虽然具备一定的艺术理解能力，但在文字训诂等方面就很差了，不象国文系受过全面基本训练的同学那样能更为清晰细密地理解古典文学。我早年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过程大体上就是如此。

问：您后来是怎样走上唐诗研究特别是杜甫研究道路的？

答：我早年读了不少唐诗，不过当时最喜爱的却是晚唐诗，年轻人多少有些感伤情绪，对李义山、杜牧、韦庄、韩偓等比较合拍，这正如龚自珍诗里所说的“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但只是欣赏，并没有想去研究他们。1927年我从北大毕业后，曾先后在哈尔滨第一中学和北京孔德学校教过国文，又在北大德文系当助教，后来又去德国留学将及五年，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这期间也没有研究唐诗的打算。我的杜甫研究，多半是客观环境所促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济大学内迁，我随校辗转金华、赣县、昆明，一路上备极艰辛，从南昌坐小船到赣县，走了七、八天，当时手头正带了一部日本版的《杜工部选集》，一路读着，愈读愈有味儿，自己正在流亡中，对杜诗中“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一类诗句，体味弥深，很觉亲切。后来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教德文，课余之暇，颇留意于中国文学，有一天在书肆偶得仇注杜诗，又从头至尾细读一过，从此形成了自己对杜甫的一些看法。当时我想，在欧洲即使是二、三流作家

也都有人给他们作传，中国却连大文豪都无较详细的传记，实在太遗憾了，萧统的《陶渊明传》、元稹的《杜子美墓系铭》、新旧《唐书》中有关李、杜等的记载，都过于简略了，为此决意给杜甫作传。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副精力来做这件事，所以我的准备工作用去了四、五年时间。我首先做杜诗卡片，按内容分门别类编排，如政治见解，朋友交往，鸟兽虫鱼，等等。同时对唐代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沿革，也作了必要的了解，国内学者如陈寅恪等的有关著作，也都读了。另外，对杜甫同时代诗人李白、王维等的生平、思想、创作情况，也有了基本的掌握。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才开始写《杜甫传》，那已经是1947年的事了。还是因为杂务牵缠，解放前只陆续写出了《长安十年》、《杜甫在草堂》等几章。解放后有些同志催促我赶快写完，遂于1951年全部完稿，分期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整整登了半年。发表后，社会上反应还较好，夏承焘先生等都给予热情鼓励。《杜甫传》在写法上也受西方一些传记文学的影响。我要求自己第一要忠于史实，不能有一点虚拟悬测，还杜甫以本来面目，他的伟大之处和历史局限性都要写够，写出分寸。第二我不作枯燥烦琐的考据。考核史料并非没有意义，主要是它同传记的文体不合，传记应当带有形象性，写出性格。当然，《杜甫传》也不能说已经尽如人意，无疑还有不少缺点。

问：您还有《杜甫诗选》……

答：在写《杜甫传》的同时，我已经拟定了选目。《杜甫传》完成后，我把选目交浦江清、吴天五二位先生，由他们作注释，后来我又写了序，于1956年出版。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我长期在北大西语系和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职务，工作很繁忙，除了1962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时作过报告、写过文章外，再也挤不出时间对杜甫作进一步研究，尽管心有恋然，亦无可奈何。前年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写了杜甫的条目，就算是我最近的成绩吧。

问：七十年代初曾刮起一阵抑杜扬李之风，当时也批评到您的《杜甫传》，在我的记忆里，您从未作过回答。对此您现在的见解如何？

答：我觉得抑李扬杜或者抑杜扬李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应

当承认李、杜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都有成就，但各有特色，我们不当站在一方的立场上去贬抑另一方。其实李、杜两人生前倒是友情诚挚，互相敬重，谁也没有故意贬低谁。当然，后人随着时代风尚的变易和个人爱好的差异，对他们可以各有所好，这也无足怪。宋人对杜诗很推重，明人就不同了，在他们的诗选里对杜甫颇轻视。我们正视历史上曾有过这种褒贬抑扬之争，但我们自己则用不着去参与这种争论。至于七十年代初的那一股风，用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来对待李、杜，极尽褒贬抑扬之能事，那是很不严肃的。说穿了，那是按一定的意图随心所欲地写文章，投合时尚，丧失了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其实，发难者本人过去也很推崇杜甫。去过成都草堂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一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不就是证明吗？我认为，一个人对古人的评价可有所变，但是跟着风向转移，那是一种不良的学风，不能说是什么学术研究。所以我对于当时扬李抑杜的那股风，从未加以理会。

问：冯至同志，您曾写了很多新诗。那末，您的新诗创作同古典诗歌有没有关系呢？

答：我的新诗从古典诗词中吸取了不少养料，也借鉴了西方诗歌的一些表现手法。不过，早期的个别篇章，受旧诗词情调的影响较多，那时有朋友对我说：“你写的新诗没有摆脱中国旧诗词的情调。”这就不能说是优点，而是一种缺点了。我认为，新诗应当反映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色彩，为此就要多从现实生活中摄取养分。同时，也应按照作者的不同条件，向古今中外的诗歌学习，尽可能多读些别人的作品，以增进经验、提高水平。但对他人的东西只能是借鉴，不能机械地模仿，归根到底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问：现在一般中、青年同志治学，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分家分得相当彻底，能够兼通的人材不多见，在这方面同老一辈学者差距不小。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答：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现在的中年学者，多是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他们在中学里的外文基础没有打好，上大学后，学中文的主要精力花在中文上，很少有人能够补外文这一条短腿，这就影响

了他们同外国文学的接触；学外文的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学外国语言上，读外国文学作品尚且不够，更谈不上接触多少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了。大学才开始学外国语言，这未免太晚了些。听说曹禺在中学时就读易卜生原著，所以他很早就能写出《雷雨》那样的作品，现在大学生恐怕要到三、四年级才能读懂原著。这问题的症结在中学里，中学生的外语不过关，就很难解决。可是现在中学外语教师非常缺乏，很难指望在短时间内中学外语教学有较大的提高，因此大学生的中外文分家也就难以避免。

我一向主张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应当了解中国文学的过去和现状，特别是中国的当代文学。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在于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借鉴。这样有的放矢，研究工作才有意义，也容易做出成绩。相反地，如果为研究而研究，那无异于钻牛角尖。再说中国人去钻外国牛角，能否钻到那尖上还是个问题。比如研究莎士比亚，外国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可以开设一个图书馆，你想再发现一点学术上的新东西，谈何容易！但结合中国的实际和需要来研究莎士比亚，还是大有余地的，从这一角度来给整个莎士比亚研究增添一部分内容，还是能够做到的。所以研究外国文学，实在不能脱离中国文学，倘能有一些古代的文史知识就更好了；同样，研究中国文学的懂得一些外国文学，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们国内一个时期以来把专业分得那样死，学校里搞中文和外文的老死不相往来，我希望这种情况逐步得到改变。记得过去闻一多曾有这样的建议：大学设文学系，中外文合在一起，对中外文学融汇贯通地进行学习，此外另设语言系，专门学习中外语言。这意见很新颖，也有一定道理。其实在欧洲就有这么办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里文学和语言就分开设系，文学系不只讲本国文学，各国文学都讲。这样分系，我国目前办不到，但比较可行的是，大学里的中文、外文两系互相沟通，多共同讨论研究一些问题，这样可以消除部分隔阂。

现在提到比较文学，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课题。中外文学的共同点、相异点，甚至双方毫不相干的东西，都可以作比较研究，从中

得出一些有启发性的、甚至带规律性的结论，那就很有益处。不过搞比较研究，也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运用科学的方法，避免牵强附会。有的文章硬把卡夫卡的《变形记》同《聊斋》中《蟋蟀》相比，那就太勉强了。同就是同，异就是异，生拉硬扯，徒然混淆视听。

问：现在有人提作家要学者化，这个说法如何？

答：我知道这个说法，是王蒙提出来的。提得有道理。作家很重要的要有生活，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还应当向他们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没听说知识狭窄浅薄的人能成为大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哪一个不是古今中外、学识宏富？外国的一些大作家也是这样。我个人知识很贫乏，每逢写作，常有捉襟见肘之感。当前我们有些作家很有才华，有的也很用功，但知识底子薄了一些，对他们来说，还要多读点书，多学习。作家不一定由学校培养，主要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提高，但一定要具有扩大充实知识的自觉性，走知识自修之路，这对他们的创作将大有助益。对于评论界，这个问题同样重要。现在有人常说一些外行话，乱贴标签者有之，随意解释者有之，说什么“张辛欣的小说存在主义”，其实彼此沾不上边，这真是捡来个名词赶时髦。没有扎实的知识根柢，文学评论工作也难以做好。

(1984.1.30, 徐允平记)

•
王戎俭吝
•

江风

①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司徒王戎，既显贵又富有。房屋、仆役、良田、水碓之类，应有尽有，洛阳一带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但对契约帐目，却常常和夫人在烛光下摆开筹码，反复计算。

②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王戎有良种李子，卖了担心别人得到种子，所以，总是把李核钻破再卖。

③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递还钱，乃释然。

王戎把女儿嫁给了裴頠，借了几万钱给女儿。每次女儿回娘家，王戎总是露出很不高兴的神色。直到女儿把钱还给他，王戎才露出笑脸。

〔评析〕王戎官居司徒，“既富且贵”，却吝啬到如此地步，简直令人作呕。这同石崇杀美人以劝酒、王武子以人乳喂小猪、石崇与王恺斗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表现了士族阶级的腐朽没落。作者选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却深刻入微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很值得借鉴。

(选自《世说新语》)



什么是“宫体诗”

周 振 甫

什么是“宫体诗”？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梁书·简文帝纪》称简文帝萧纲“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这是说宫体诗是“伤于轻艳”，轻指轻靡，艳指绮丽，即题材比较细小，内容琐碎，文词绮丽，没有接触到宫廷的淫荡生活。二，《梁书·徐摛传》：“摛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会晋安王纲出戍石头”，“以摛为侍读”；“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管，寻带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太子宫)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是说，宫体诗是徐摛开创的一种新变体。徐摛在萧纲封晋安王时，就跟他做侍读，一直到萧纲封太子时。他的新变体诗影响到太子宫内的学士。《梁书·庾肩吾传》称萧纲“及居东宫(太子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即太子宫内的学士最著名的有庾信、徐陵等，他们都学徐摛的新变体，因此称为宫体。三，魏征《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梁简文帝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仿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迄于丧亡。”这里指出，宫体诗是萧纲写宫廷中的淫荡生活，影响到朝野，成为亡国之音。这种说法对后来的影响最大，我们一谈到宫体，就想到这种说法。

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符合实际呢？要作出判断比较困难，因为《隋书·经籍志》著录《梁简文帝集》八十五卷，绝大部分都已亡佚，根据现存的萧纲的诗来作判断，可能不完全正确，但还是可以作出判断的。魏征说萧纲的诗“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他没有讲

这部分的诗占多少。看萧纲现存的诗，这部分占的比例比较小，他的绝大部分的诗不是反映宫廷中的淫荡生活的。因此，魏征的批评是夸大的。一个新朝兴起时，对前朝的缺点往往要加以夸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萧纲反映宫廷中淫荡生活的诗虽是少数，也应加以批判。如《和湘东五名士悦倾城》：“履高疑上砌，裾开特畏风”，注意女方的风吹“裾开”，说明他对女方注意的是什么。“妆窗隔柳色，井水照桃红。非怜江浦佩，羞使春闺空。”神女在江浦把环佩送给郑交甫，是对交甫有情。这里说不是对名士有情，是羞于闺中无人，这就诬蔑美人有“不能让闺中无人”的想法。《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衣裁合欢褹（衣褶），文作鸳鸯连，针用双缝缕，絮是八蚕绵。”作的卧具，想的就是合欢、鸳鸯、双缝、蚕绵。联系“更恐从军别，空床徒自怜”句，可以看出，这里字面上的意思是“怕空床”，实是对女方的一种变态心理。《率尔为咏》：“疏花映鬓插，细佩绕衫身。谁知日欲暮，含羞不自陈。”把日暮同含羞结合，也是写这种心理。《咏内人昼眠》：“簟（diàn）文（竹席）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注意腕上的簟纹，衣上的香汗，已经不正常，对妻子说成“莫误是倡家”，更显得轻薄。这种诗，所谓“止乎衽席之间”，反映了一种变态心理，是要不得的淫荡之作。萧纲这部分淫荡的诗，在他的文德省学士中的影响怎样呢？徐摛留下的诗只有五首，绝无淫荡之作。庾肩吾留下的诗较多，也没有这样的淫荡之作，庾信的诗也一样。徐陵有一首《杂曲》：“流苏锦帐挂香囊，织成罗幌隐灯光。只应私将琥珀枕，暝暝来上珊瑚床。”当是同类之作。又鲍至的诗里也没有淫荡之作。看来，萧纲这部分的诗，在他的学士中影响不大。

萧纲绝大部分的诗，是他自己说的“伤于轻艳”，轻艳和淫荡不同，他的注意力不是“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闼之内”，不是写一种对女方的变态心理。他写的题材比较琐细，写了不少咏物诗，这种咏物诗没有什么寄托，不能表达高尚的志趣，只讲究对偶词藻。如《上巳侍宴林光殿曲水》：“风旗争曳影，亭臯共生阴。林花初堕蒂，池荷欲吐心。”他在侍梁武帝宴会时，对国计民生都不想，注意的是旗影亭阴，是花落荷开，就这样注意琐细的事物。四句都对偶，讲词采。又

象《登烽火楼》：“万邑王畿旷，三条绮陌平。巨原横地险，孤屿派流生。悠悠归棹入，渺渺去帆惊。水烟浮岸起，遥禽逐雾征。”当时南北对峙，曾发生过大小不等的多次战争。他登上烽火台，把这些重大矛盾掩盖起来，说成“万邑王畿旷”，好象已经天下太平了。他注意的是平原、孤屿、归船、浮烟、遥禽，一些琐碎的事物。再象咏物诗，如《初桃》：“飞花入露井，交干拂华堂。若映窗前柳，悬疑红粉妆。”注意的是落花、交枝，和以花比美人。象《咏桔》：“攀枝折缥干，甘旨若琼浆。无假存雕饰，玉盘余自尝。”讲的是采橘和尝橘，别无深意。这样的诗，内容贫乏，所见者小，只是讲究对偶词藻，所谓“伤于轻艳”，是萧纲宫体诗的主要特点。这种宫体诗，对他的学士影响较大。如庾肩吾《从皇太子出玄圃应令》：“绿荷生绮叶，丹藤上细苗。顾循惭振藻，何用拟琼瑶。”注意荷抽叶，藤抽苗，自愧无才。《咏美人》：“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曲中人未取，谁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识，唯听使君知。”注意照水时怕水动，敛袖怕风吹等细节，归结到要使君知。还是属于轻艳。再象庾信的《王昭君》：“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绿衫承马汗，红袖拂秋霜。别曲真多恨，哀弦须更张。”想到的是人瘦、垂泪、马汗、秋霜和怨恨，也是注意小的方面，注意词藻。看来注意细微末节，忽略当时南北战争的重大题材，忽略人民的苦难，只写琐细的事物，写咏物诗，讲究词藻对偶，是萧纲宫体诗的特点，这个特点也影响了他的学士。

再看徐摛的宫体诗，特点是一种新变体。他在萧纲封晋安王时，就在萧纲手下做侍读，“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到萧纲封皇太子后，他的学士更受这种新变体的影响，有宫体的称呼。这种新变体的特点是什么呢？沈约《宋书·谢灵运传》里讲到永明体：“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本着四声来调配句中的声调，他把四声一分为二，即宫羽、低昂、浮切、轻重。当时还没有把四声分为平仄的说法，只好用宫羽、低昂、浮切、轻重来说。但怎样把句中的声调调配得当，沈约也不清楚。他说：“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他说的“韵与不韵”，既指押韵，又指句中声调的调配。因为押

韵只要有了韵书就解决了，解决不了的是句中声调的调配问题。试看沈约的《咏箏》：

秦箏(平)吐绝调，玉柱(仄)扬清曲。弦依(平)高张断，声随(平)妙指续。徒闻(平)音绕梁，宁知(平)颜如玉。

沈约要解决的声调调配问题，实际上就是后来平仄的调配问题，所以可以用后来的平仄来做说明。只看这诗每句的第一个音节，首句是平，次句是仄，是调配得恰当的。但第三、四、五、六句的第一个音节都是平，就没有调配好。那末沈约永明体的成就表现在：一，讲究对偶，六句皆对；二，已经注意声调的调配，虽然还没有调配好，但一二两句的调配是对的，象“玉柱(仄)扬清(平)曲(仄)”，句内声调的调配也是合的。只是合的少，不合的多。

再看徐摛的新变体，如《咏笔》：

本自(仄)灵山出，名因(平)瑞草传。纤端(仄)奉积润，弱质(仄)散芳烟。直写(仄)飞蓬牒，横承(平)落絮篇。一逢(平)提握重，宁忆(仄)仲升捐。

拿这首诗同沈约的诗来比，这首诗句和句之间的声调调配全合了，比沈约的大部分不合要强多了。这首诗每句内的声调调配，除了“奉积润”联用三个仄声字不合外，也全都合了。在声律上，它比沈约的永明体进了一大步，更接近律诗了。徐摛的五首诗不是首首这样，有的在声律上不合的多些，但总起来看，比沈约的诗更接近于律诗。不仅徐摛的诗是这样，萧纲的诗和萧纲学士的诗也都是这样，以下各引一首。萧纲《采菱曲》：

菱花(平)落复含，桑女(仄)罢新蚕。桂棹(仄)浮星艇，徘徊(平)莲叶南。

这首诗的格律跟五言绝句完全相同。庾肩吾《春日》：

桃红(平)柳絮白，照日(仄)复随风。影出(仄)朱城外，香归(平)青殿中。水映(仄)寄生竹，山横(平)半死桐。颁文(平)知渥重，搦札(仄)愧才空。

这首诗，第五句第一个双音节的调配不合律，其余都合了。这样看来，徐摛的新变体出来后，萧纲学它，萧纲的学士也学它，成为一时风气。

现在再来回答什么是宫体诗问题，宫体诗的发明权应归于徐摛。宫体诗实是一种新变体，它把沈约的永明体推向律化，把律诗的形成推进了一大步。这种新变体创立后，萧纲学它，萧纲的学士也学它，成为一种新体，因流行于太子宫，所以称为宫体诗。新变体是就宫体诗的形式说的。就它的内容和风格说，就是“伤于轻艳”。徐摛的诗传下来的只有五首，四首是咏物诗，即《咏笔》、《咏橘》、《坏桥》、《赋得簾尘》。《咏橘》的一首，把屈原《橘颂》的有寄托这个传统丢了。萧纲和他的学士也写了不少咏物诗。这类宫体诗题材狭窄，只写了些细微末节。把当时南北斗争的重大事件，国家和人民的苦难都抛在脑后，只追求对偶和词藻。所以它的毛病是“伤于轻艳”。新变体与“伤于轻艳”是宫体诗的两个方面，是合一的。至于用这种体裁来写宫廷中的淫荡生活和变态心理的，主要是萧纲。萧纲这方面的诗也不多，不能代表他的宫体诗的全部，他的学士也很少写这方面的诗。因此，似不宜把这部分的诗作为宫体诗的代称。萧纲的晚年，也写了一些较好的诗，只可惜太少了。如《慙乱诗》写侯景反叛围攻京城，城内都怪朱异弄权，这诗也责怪朱异：“瞻彼阪田，嗟斯氛雾。谋之不臧，蹇我王度。”阪田是饶瘠的田，比喻国事的艰难。祸乱逼来，使得他的诗也不得不变了。就是他的咏物诗也变了，如《赋得白羽扇》：“可怜白羽扇，却暑复来氛。终无顾庶子，谁为一挥军。”想到晋朝的顾荣，在广陵相陈敏反叛时，顾荣暗中约定甘卓、纪瞻等起兵攻陈敏，他用白羽扇指麾，击溃叛军。这使人想起侯景叛乱时，梁朝就没有一个顾荣来平叛。这样的诗，就改变了他的“伤于轻艳”了。他又有《被幽述志诗》：

恍忽烟霞散，飍飍松柏阴。幽山白杨古，野路黄尘深。终无千月命，安用九丹金。阙里长芜没，苍天空照心。

他被侯景幽禁在山里，美好的梦象烟霞散了，听到的只有松柏的风声，只有在墓道中的“白杨亦萧萧”了，自己不能寿终，快要被害死了。儒家宣扬的人伦纲纪都被侯景破坏完了，苍天也无能为力。在这里，他表达了自己所受的迫害，指斥侯景败坏人伦的罪恶，他以自己的被幽之作，来洗刷他的“伤于轻艳”了。只是他写的淫荡之作，成了宫体诗的一个污点，却无法洗饰。

（题头篆刻 刘博琴）

杨德炳

魏晋南北朝 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户等级区别士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不同地位;门阀贵族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这一时期著名的门阀集团,正如唐人柳芳所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卢、崔、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大致可分为江南士族、北方郡姓和

鲜卑军事贵族。门阀制度渊源于东汉,形成于魏晋,东晋是它的鼎盛时期,南朝以后逐渐衰落,唐中叶以后作为一种制度终于在历史上消失。

一 门阀制度的形成

东汉以来,随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也逐渐出现与加强。在地主阶级内部,一部分贵族官僚凭借其“世代簪缨”,族大人多,经学传家等优越条件,广占田土,拥有大量奴客家兵,并通过把持乡里清议来操纵官吏的选拔;这便是所谓的“大族”和“名士”,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上层。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则由地方土豪或由商人转化来的地主构成。他们的土地财产倒不一定都逊于前者,但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则远不如前者;他们通常被称作“单家”。以上便是门阀制度得以形成的经济和阶级基础。

到了三国时期,在混战中获胜的大族名士不仅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而且取得了许多特权。先后在孙吴和曹魏出

现的荫客权就是其中之一。西晋统一后(280)颁布的《户调式》，则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门阀地主在占田、荫族、荫客诸方面所享有的特权。门阀地主在政治上的特权则是通过对曹魏初期创立的九品官人法的改造而获得的。九品官人法简言之就是朝廷在州郡设置中正，负责将当地人物评为九品(叫“乡品”)，然后由政府根据乡品的高低授予相应的官职。乡品高，做官的起点(又叫起家官)就高，升迁也快；乡品低，做官的起点就低，升迁就慢而且有限。魏初中正品评人物的标准本是家世、才、德三者并重，但由于中正的位置长期为高门大族把持，故越到后来才、德越被忽视，家世越被看重甚至成为唯一标准，到了晋初终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在此须特别指出两点：一是《户调式》关于按官品高低占田、荫族、荫客的规定，和历代的情况本无多大区别。但是由于九品官人法保证了高门大族世代高官的政治特权，这就使得上述经济特权也成为世袭性的了。二是《户调式》又规定只要是“士人子孙”，不管做官不做官，都可以享受荫族特权，这样“士人”就扩大成为“士族”（“士族”之名即由此时开始出现），而只要当上了士族，其世袭特权便得到了可靠的保证。总之，士族门阀上述各种世袭性特权的确立，便标志着门阀制度的形成。

二 门阀制度的发展

西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与以后东晋南朝时期相比，至少有如下区别：一是士庶之别远不如东晋以后那么严格。主要表现为此时寒门地主上升为士族的道路尚未被堵死；士庶之间的交往甚至婚姻也屡见不鲜，不象南朝那样士庶之别严格到了“天隔”的地步。二是西晋士人定品主要是依据父祖官位的高低，到了东晋南朝父祖官位的高低甚至有无官位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远祖在魏晋时的官位，即完全凭血统和门第。三是东西晋的政权结构虽都是皇室与门阀贵族的联合统治，但西晋皇权强大，皇族占绝对优势，而东晋皇权弱小，皇族处劣势地位。如东晋初年政治军事实权分别掌握在王导、王敦手中，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样一种形势决定了东晋从创建之始就